

周恩来情报生涯中的泄密事故

在我党历史上,有很多红色间谍潜伏在敌人的心脏,熊向晖就是其中之一。熊向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,是周恩来于抗战初期布置在胡宗南身边的间谍,不到关键时刻不轻易使用。鲜为人知的是,处理情报工作心思极细的周恩来,曾不慎将写有熊向晖姓氏和住址的笔记本忘在了“美国驻华特使”马歇尔的专机上,熊向晖面临着暴露身份的危险……

秘密会见周恩来

1943年7月,熊向晖曾向延安密报胡宗南企图偷袭边区的消息,仓促之间,为保卫延安,中共中央将该情报公之于众。胡宗南要求追查泄密者,当时有人举报熊向晖,但熊向晖处变不惊,灵活应对。熊向晖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和应变技巧,不仅没有受到胡宗南的怀疑,反而深得他的信任。

1946年,为了培植势力,胡宗南推荐熊向晖等17名亲信,加入国民党制订的留学美国计划,准备把他们培养成博士、硕士。

这一年的5月18日,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《攻略陕北作战计划》,计划执行“犁庭扫穴”、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。当时熊向晖正准备回南京办理出国手续,得知此事后他立即通过情报联络员王石坚密报延安。

5月下旬,王石坚对熊向晖传达中共中央的命令:“中央对胡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,现在到了和、战的关键时刻,来往电报讲不清楚,周副主席要同你面谈,要立即查告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,要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不准外出,有人会到你家,对你说‘胡公找你’,你就跟他走。”“胡公”是周恩来的代号,熊向晖知道事关重大,立刻将自己在南京的住址告知王石坚。

6月初,熊向晖从西安飞抵南京,住在卫巷32号的家中。6月10日上午,熊向晖在家里看报纸,一个中等个头儿,身穿便装的陌生人来到熊向晖家中。来人尽管神态有些焦急,但仍平静地问:“熊先生吗?”熊向晖点点头,说:“我是。”来人马上说:“胡公有事请你去一趟。”熊向晖干脆地说:“那好,我们去哪里?”“梅园新村30号。”熊向晖一惊,梅园新村30号是路人皆知的中共代表团驻地,那里敌特盯防严密,秘密战线上的同志从不去那里。

熊向晖取出外套,来说:“天气有些热,熊先生要不要戴顶帽子?”熊向晖会意,拿起一顶巴拿马帽戴在头上。“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,能告诉我吗?”熊向晖轻声地问。来人迟疑一下,说:“我叫童小鹏。”

童小鹏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,熊向晖跟着他一前一后出了大门,相隔有几米的距离。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前后左右,穿过几个街区,确认没有人跟踪后,两人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不一会儿,一辆小汽车停在两人跟前。熊向晖上车后躺卧在后座上,用巴拿马帽盖着脸。随后,小汽车来到梅园新村30号,只见人员进进出出,很是热闹,显然是为了掩护熊向晖。

会客室东边的一座高楼是特务的据点,童小鹏先下车,站在东面挡住特务视线,院子里有几个人在打排球,其中有一位是熊向晖的同学宋平。

周恩来不慎泄密

熊向晖走进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,董必武迎上来,一面同他握手,一面说:“真是光阴似箭,一晃就是8年半,你的模样没有变,似乎长高了些。”



熊向晖,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,一直从事地下工作,为保卫中共中央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他告诉熊向晖,周恩来很快就回来。

不一会儿,周恩来推门进入会客室,拉着熊向晖坐在沙发上。周恩来皱皱眉头,说:“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。7号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,研究东北停战问题,忙着开会,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。前天开了一夜的会,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。天气热,我没有穿外衣,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。我回南京还要谈判,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了一会儿,一睡就睡得很死,飞机在南京降落,我还不知道。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,下了飞机,回到梅园新村30号,发现小本子不见了,到处找也找不到,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,落到马歇尔专机的机舱里。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,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。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,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,我一时粗心,写在小本子上,还写了一个‘熊’字。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,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,下飞机时也没有注意检查,造成严重事故。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,作了初步检讨,请求处分。”

周恩来真挚坦荡的态度和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熊向晖,他激动地说:“请周副主席放心,这是一件小事,我能够应付。万一出问题,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从宣誓入党时就准备随时牺牲。”周恩来庄重地说:“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,但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。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,我要承担责任,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,不能一误再误。”

周恩来接着说:“昨天下午4点多,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,我不在,他一直等到我回来。他说,马歇尔指示他

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。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、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。我打开一看,里面装的正是我丢的小本子。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。这样,你就暴露了。”

“我和董老反复研究,马歇尔照了相,会怎么处理?一种可能是,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,他可能送给国民党。如果他送,不会送给徐永昌、郑介民这类人,那不符合他的身份。要送,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。蒋介石架子大,见他必须先约定,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。蒋介石看到后,一定会派人抓你,这又会暴露马歇尔,使他失去‘调处人’的资格。也有第二种可能,马歇尔不给蒋介石,免得因小失大。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,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,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,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。”周恩来认真分析了形势后,又问:“你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,可以不引人注意,找个借口住几天?”熊向晖讲了几处地方,包括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宅邸。周恩来说:“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,他在上海地位高,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。”

问清上述情况后,周恩来说,他已让延安通过秘密电台告知王石坚,要他提高警惕,注意敌情,准备应变。如马歇尔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,蒋介石一定会交给中统或军统查办,交给军统查办的可能性更大。中统、军统都沉不住气,军统更沉不住气,急于求成,一定会很快采取行动。按照他们的规律,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,不会超过半个月。他们惯于搞突击,突击前会有前兆。

虚惊一场

周恩来让熊向晖将情况告诉未婚妻谌筱华,然后立即到上海住半个月,找个借口不出门,由谌筱华注意家中动静,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。谌筱华如发现熊向晖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,即用暗语通知熊向晖,并让熊向晖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。王炳南已做好准备,届时会把熊向晖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。

临别时,周恩来说:“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的,胜利以后再见。今天我重复一遍,胜利以后再见。”董必武说:“我看不是重复,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,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。”熊向晖也说:“胜利以后再见。”然后与他们握手告别。

离开时,童小鹏领着熊向晖上的已不是来时坐的车。汽车驶到明孝陵荒僻处,熊向晖下车,他步行了很长一段时间,才找到公共汽车站。

按照周恩来的指示,熊向晖在上海躲了十来天,然后接到谌筱华的信,内写“王兄康泰,阁府安详”。这表明一切正常,他立即回南京办留美手续,并于10月初飞到西安试探胡宗南。胡宗南对他的态度丝毫未变,“事故”未产生问题,这次泄密事件不过是虚惊一场。

1947年8月,熊向晖赴美,1949年经香港回国。11月,周恩来宴请张治中等人,熊向晖应邀出席,周恩来向客人公开了熊向晖的身份秘密,举座皆惊:胡宗南身边一等一的红人熊向晖竟然是红色间谍。

(摘自熊向晖《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》)

文史小语

周恩来何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

周恩来从小就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。因为看到民族危亡、山河破碎,他在少年时代就萌发强烈的社会使命感,懂得了“为中华之崛起”而努力学习的道理,树立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伟大抱负。

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、屈辱中拯救出来?怎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?这些问题成为推动他不断向前求索的动力。进入中学后,为挽救“积弱不振”“外侮日逼”的祖国,周恩来积极组织进步团体,“研究各种学识”,探求救国真理,并大声疾呼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。

周恩来认为,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志向。在一篇作文中,他是这样写的:“故凡同一人类,无论为何种事业,当其动作之始,必筹划其全局,预计其将来,抱无穷之希望。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,则其结果不致

与此希望相径庭。希望者何?志是也。”

随着时代的发展、年龄的增长以及对国情了解的加深,周恩来忧国忧民的心情更加炽热。1917年9月,他在东渡日本留学途中,看了临行前朋友给他的《新青年》(第3卷第4号),感觉很好。到东京后,他把《新青年》第3卷全部借来细看。

1918年春节期间,处在苦闷之中的周恩来再次把《新青年》第3卷找出来,重新阅读。《新青年》所持的新思想新观点,使他感到眼前豁然开朗。他开始树立这样一个信念:在“思想”“学问”“事业”上,都要毫不犹豫地抛弃“旧”的,追求“新”的,“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”。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兴奋地写下两句诗:“风雪残留犹未尽,一轮红日已东升。”

当时,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传到日本,马克思主

义在日本广泛流传。周恩来在东京买书时随便翻阅新出的杂志,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,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他在日记中凭记忆写下了800多字的摘要,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有了一定的了解:“按现在的情形,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。过激派的宗旨最符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,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。资产阶级制度、宗教的约束,全都被打破了。世界实行社会主义,恐怕要拿俄罗斯作为第一个试验场了。”

此后,周恩来又先后阅读了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《震动全球的十日》、日本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——幸得秋水的《社会主义神髓》以及河上肇的《贫乏物语》,内心燃起了新的希望。

(据《解放日报》)